



人海诗韵·艺术文化散文丛书

主编 金元浦

■袁济喜



人生交換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人生交换 / 袁济喜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1999.5

(人海诗韵 : 艺术文化散文丛书 / 金元浦主编)

ISBN 7 - 80615 - 948 - 7

I . 人… II . 袁…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 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3832 号

5267
· 54 ·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hp.com>

责任编辑:林星海 封面设计:张幼农

责任技编:陈 焰 责任校对:黄海燕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海天出版社经销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mm × 1168mm 1 / 32 印张:9.125

字数:170 千 印数:1 - 5000 册

定价:14.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在都市的喧嚣和熙攘中，在纷扰的车流与人潮中，您是否还能闭上眼，享受一刻宁静的思？

诗人说，够了，让我享有缄默！

在时尚扑面的嘈杂中，在斑驳陆离的霓虹的频闪中，哪里是可以独步的林中路？

哲人说，林中氤氲的雾霭中，总有隐约的诗意漾出。

我们活着……

我们如此辛劳地奔行于这个世界……

我们总得活着，焦灼、繁忙、疲惫而又倦怠……

然而我们的婴儿依然充满激情地啼叫着坠地，我们的婆母依然为孩子们腌制过冬的咸菜……

昨夜，我如此困顿、疲累、愤懑，乃至沮丧万分。而清晨，我擦一把脸，依然得驱车前行，匆匆地赶路。车窗外，偶尔一瞥，路旁的野苗条正恣意而蓬勃。我想起年轻时写下的诗句：

我背着浓浓的乡愁，
从南找到北，
找我寻诗者的乡梦……

真想烧掉所有的诗稿，
背起牛角号，
向莽原深处走去……

那是一份来自青春的恒久的祈愿。“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我们总得为我们的活着寻找意义，我们总得为我们的奔忙命名。我们总会无奈地奔行于意义—意味之途，在岁月的瓦砾中翻拣燧石。

在这无诗的年代里，我固执地寻诗。

文明之累是如此沉重，我钟情于林中路，钟情于艺术。

艺术的本性是诗，诗的本性是真率的生之舞。

然而存在之思却永遭遗弃，思之诗性则总被遮盖无存……

人，诗意地栖居？

这是箴言，还是咒语？我固执地叩问这一被用滥用乏，变得时髦而光滑的饰物。

人，诗意地栖居！

我仍然艰难地选择了它。

于是我邀集师长和朋友们一起来做一次思之远游，任丝丝意绪杳然飘岚，让脉脉思缕徜徉于天海之间。

思永远是突然地莅临——谁的惊奇能触摸到它？

故而有了这套“人海诗韵”艺术文化散文书系。

感谢海天出版社，感谢总编旷昕先生，感谢祝匡三兄，感谢他们的眼光与魄力。也感谢来小乔女士、徐丹娜女士、林星海先生及诸位编辑，他们为本套书系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谨为序。

金元浦

于海淀塔院迎春园姑妄斋

1998年10月16日

目 录

▲哲人其萎	1
▲血色土风	19
▲人生交换	49
▲中古风采	81
▲人淡如菊	107
▲真的猛士	121
▲文化迷踪	133
▲和而不同	157
▲回味古典	167
▲庄生晓梦	175
▲生命为书	182
▲心与文游	194

▲文坛杂论	203
▲棱形批评	217
▲浮世断想	232
▲往事烟云	248
▲东瀛走笔	260
▲湖山梦蝶	268

哲人其萎

公元前 479 年，在鲁国一所古旧的邸宅前，年迈多病的孔子拄着拐杖，正在等候学生子贡来看望他。晚年的孔子，心爱的子弟大都年命不永，颜回早死，子路在一次兵乱中被杀，所以处于孤独中的孔子有一个学生来看望就感到莫大的欣慰。子贡姗姗来迟，孔子不无怨艾地对他说：“赐（子贡的字）啊，你为什么来得那么迟？”接着孔子不知触动哪一根情肠，唱起了一首凄凉的悲歌：“泰山啊，快要崩坍了，栋梁啊，快要倒塌了，哲人啊，快要萎颓了。”唱完这首歌后，孔子悲伤地对子贡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我对此也无能为力

了。”七天后，孔子在孤独中去世。孔子的孤独与他晚年的心境，是中国古代士人的共同遭遇。中国灿烂的古文化，其创造主体的士人却大都是在孤寂中坚守素志，营造文心的。可以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孤独文化，这并不是士人的故意选择，而是由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衍生的一种文化。春秋战国时代，许多著名士人都有着与孔子相类似的命运遭际，就说明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它促使我们去追寻其中更深远的文化与心理渊源。

当我们回溯人类始祖的蛮荒时代时，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古人说的所谓六合内外，天地之中，华夏族的形成是较为初始的。与世界其他发达民族文明的诞生相比，华夏族的兴起，也是依赖于河流文明的灌溉。在古代黄河、长江及其支流滔滔不息、倏忽万变的生态环境中，初民们艰难地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矗立起灿烂的中华文明的辉煌大厦。

英国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史学名著《历史研究》中曾这样描述距今大约五六千年前的黄河两岸的人文地理状况：

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

间变换。

汤因比的历史发展动力学说是建立在著名的文明起源于挑战这样一个观点之上的。照之以史前黄河文化的历史，它大约是站得住脚的。中国史前文明大约在距今几十万年前的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和北京房山周口店地区都可以找到它的历史遗迹。但中华民族正式进入人类文明时期，开始制造工具，从事农耕渔猎生活时，却是在黄河文化年代，作为一种文化遗迹的个案，仰韶文化最具有代表意义。这个时期人们面临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远较今天的人类要严重。鲁迅先生指出：“因为中华民族先居在黄河流域，自然界底情形并不佳，为谋生起见，生活非常勤苦，因之重实际轻玄想。”按照香港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教授在《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的考辨，那时候华夏族的先民们自然而然地在黄河及其支流的两岸地区，汲水耕种，从事农业与渔业，为此他们按照血缘关系，结合成氏族部落，聚族而居。他们有共同的生产方式，宗教仪式和活动场所，死后都葬在氏族的公共墓地内。据《庄子·盜跖篇》描述，当时的社会人人同心协力，和谐相处，“无有相害之心”，是一幅理想的人间乐园图景。

这种氏族社会经历了一定阶段，进入夏、商、周阶级社会后，原始的血缘关系纽带被家长制的世袭制度所取代，最后产生了宗法制与礼乐系统。这种制度与文化体系，其实是原始社会内部氏族血缘关系的衍变。从此

社会被置于严密的血缘观念与政治相结合的系统之中。不过，社会毕竟是在演变的。经过夏商周社会，到了春秋时期，原来的宗族社会开始崩坏。这是一个改天换地，重新调整人际关系的时代，人的自我意识终于冲破血缘宗法关系破土而出。这既是人的解放的年代，同时也是人的悲剧开始的年代。人们尖锐地感到社会与自己处于对立与冲突之中，人生的理想已不再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祭祀的神坛，而是返照自身，在内心世界中省观自我，孤独意识成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先秦儒、道和屈原的思想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找到它们的踪迹，在世界精神史上，中华民族的孤独意识可以说是最为早熟的。

孔子的孤凄

春秋战国时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社会变迁，使素以礼乐文明著称的宗周社会出现了文化上的断裂现象，过于严密的守法分封制度及其“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礼乐观念，已被新兴地主阶级的生产方式以及观念体系日渐取代。于是，出现了对传统文明进行重新解释与调整的儒家学派，它是当时众多思想学派中最有影响的“显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群顺阴阳明教化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所谓儒家这一学派，其实就是从最早的西周官府中掌管教化的司徒之官发展而来的，它的职责就是帮助国君根据阴阳术数的变化来教化人民，顺从

神道。说白了，最早的儒家其实并不是后来人们印象中的读书人，而是一群巫师兼宰辅性质的人物。儒家理想中的人物，如皋陶、周公均是辅佐人君、调和阴阳的牧师型人物。他们的职责是适应当时的统治者需要，制定一套稳固人伦大业的意识形态系统。鲁迅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曾经辛辣地指出，孔夫子曾经设计过出色的治国方略，但那是为权势者们设计的，为老百姓设计的则一个也没有。语虽尖刻，但也说明了原始儒学的本来面貌。毫无疑问，在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社会中，群体意识是高于一切的。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处于裂变时期的孔子，其学说更多地强调人伦中的血亲观念，把人伦之爱、社会和谐推崇为至美的人世。约成于秦汉之际的《礼记·礼运篇》曾以赞赏的口气描述了大同社会的情景，这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使男女老幼残疾之人都有所归，实行财产共有，夜不闭户。

这种理想的大同境界是否真实，不得而知。先秦时韩非子、墨子对上古社会的描写却是另一幅剧烈相搏的情景，与它迥然相异。但大同社会揭示的理想社会却是儒家至为推赏的人际关系典范，与庄子所讴歌的远古社会情景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亲爱，各得其所，身心不全者皆有所养，自然也就消除了人的孤独心态。在孔子看来，孤独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至少是社会心理系统不完善的体现。但孔子同时也承认，社会向着私有化制度的进化毕竟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以及兵戈相攘、奸诈

横行的社会终于出现了，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孔子对此当然是痛心疾首的。如何挽救这种人心不古的趋势呢？孔子认为关键是唤醒人们内心的仁爱之心，而这种仁爱之心缘于三代时中华民族的氏族血缘亲情观念，这种观念的最基本的因子便是孝与悌这两种最简单的人伦观念与关系，其他的礼义观念与廉耻观念都是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从这一点来说，孔子的伦理学说是一种基于人际关系的道德本体论。

孔子认为，推行三代之治的要径是重新确定人们心目中的道德观念，这个道德本体是仁爱之心。在回答弟子樊迟问什么是仁时，孔子以简洁的语言阐明了仁的要旨是爱人，它的具体内容就是“孝”与“悌”这两方面的血亲观念。但是，这种仁爱如果只限于个人心灵就达不到和合群体的境界。孔子强调：重要的是把这种道德修养，推广到人际社会中，克服一己之爱，从而进入“泛爱众”的崇高境地。在孔子看来，如果一个人突破了一己之爱的樊笼，就像后来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社会上的人们就会和谐相处，人际关系可以建立在稳固的礼乐基础之上，孔子憧憬的三代之治也就实现了。孔子对人我关系的处理，是由个体出发，上升到群体。在群体的和谐中，个体价值得到升华，从而孤独感也就被消除了。后来汉代《礼记·中庸》、《大学》中提出君子的成长之路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遵循的也不外乎是这一条修养途径。

当然，孔子也很清楚，在现实中，人们由于各种不

幸遭际，特别是不被别人理解时，难免会产生怨艾悲愤和孤寂苦闷等情绪，因为人毕竟不是超凡入圣的神人。就拿孔子来说，当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时，也时常发出各种牢骚不满之语，甚至恨恨地骂他的学生以出气。不过孔子同时又认为，道德充实的君子，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乐天安命，心神怡然，保持心理平衡。孔子曾经极力称赞大弟子颜回达到了这样的人生境界。颜回居住陋巷，衣食粗糙，无依无靠，形影孤单，但他心志高尚，安贫乐道，在实践仁学的过程中乐天知命，并不感到孤独。可见，一个人道德高尚，就会超越自我，达到最高的人格境界。孔子称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都是强调士必须弘毅其志，任重而道远，忍受常人所不能忍的艰难困苦，矢志不渝地去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这正是后来鲁迅先生赞扬的中华民族的脊梁精神。

在孔子的时代，诸侯力政，天下纷乱，许多有识之士看破时局，退隐自保。他们的隐居本身也是对社会现状的抗拒，以孤独的方式来保持人格的完善。孔子对于隐居避世是不赞成的。当时著名的隐士长沮、桀溺躬耕农野，韬光晦尘，以躲避污浊的社会。他们对孔子率领弟子汲汲惶惶，回天乏力的行为很看不惯。他们认为方今天下纷乱，无法挽救，与其像孔子这样周游列国，挽救世道，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还不如避世而居。孔子对他们的处世态度甚不以为然，认为鸟兽不可与同群，人总是要生活在社会之中的，天下纷乱的状态是无法容忍

的，所以他决心“知其不可而为之”，以救世主自居，恢复他理想中的三代之治。表面看来，孔子很固执，但同时他在内心也是很矛盾的，对自己的理想是否能实现也是心存疑惑的，并不像后世儒家人士说的那样强悍与圣明。尤其是他奔波一生，推行仁义，最终落落寡合，不但有权势的国君大臣不理睬他的政治主张，就是平民百姓也嘲笑他迂腐顽固，在他被围于陈蔡之地时，他的弟子中如子路等人还公然对他的理想表示曲高和寡，难以让世人所接受。所以孔子晚年一再慨叹：“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及西狩见鲁人获麟，喟然而叹：“吾道穷矣”，“莫知我夫”，哀叹自己的努力无济于事，不为世人所知。内心深深地被孤独攫住了，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

孔子的孤独感，来源于行道遵义而不被人理解的痛苦，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种最高层次也是最难消解的痛苦。且不说世人，就是他的学生中也很少有人能真正洞晓他的苦心孤诣。孔子困于陈蔡时，饥饿难耐，处境狼狈，许多学生都有怨言。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含辛茹苦，行道施义，却总是受人冷落，甚至遭到围攻。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与他的学生子路、子贡和颜回等人有过一番对话。子路发牢骚说，老师的行为不被世人理解和认可，是因为没有做到仁至义尽，审时度势，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孔子则反唇相讥：伯夷、叔齐可谓仁者，可是为什么他们却成为饿殍？王子比干可谓智者，为什么却死于非命（指殷纣王的弟弟比

干因见纣之无道，挺身而出加以谏劝，最后被纣王剖心而死)？意谓自己躬行仁义同这些先贤一样，是不被世俗认可，责任并不在自己身上。另一个学生子贡劝孔子稍降其志，以求容于世道，也遭到孔子的批评，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倒是大弟子颜回说得比较投合孔子的心意：“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意思是说老师的道德境界至高至大，那些芸芸众生无法理解，当然也就无法支持，这恰恰是世俗之弊，而非老师之学的过错。这话虽然不无拍马屁之嫌，但正像俗话所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虽圣人也难以免俗，所以孔子听了这话之后心情大为好转，着实夸奖了颜回一番。站在今天来看，孔子“之道至大”，虽然从道德境界来说无可挑剔，但从当时的实际来说，其实是迂阔不周世用。在社会冲破宗法血缘纽带的羁绊，向前进化时，孔子却要恢复宗周之礼，当然是“天下莫能容”了。但是孔子批判物欲横行的世风，坚持古代的仁爱之心，在当时具有发摘时弊、鞭笞权势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孔子试图用人性与理想的光辉来烛照当时“礼崩乐坏”、人心浇漓的世态，因而曲高和寡、孤独无俦，这也是后来中国知识分子孤独心态产生的悲剧原因。

晚年孔子是在极度凄凉孤独中度过的。颜回早死，子路被杀，子弟飘零离散。孔子在研玩《周易》，删削《春秋》，修订《诗经》中寄托自己的孤愤。孔子为了排遣孤独，向往超脱的人生境界，常常击磬，在音乐中寄托人生感慨。荷筐而过的路人听出其中的弦外之音，于

是感叹孔子的执着与迂腐，意为没有人理解也就算了，何必那么哀伤。孔子在与他的学生讨论人生志向时，为弟子曾点所描绘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情景所深深陶醉，这是一种超脱人生各种羁绊，包括孤独心态在内，以神往自由为特征的境界。尽管孔子执着于“克己复礼”的信条，但从内心来说，他并没有摈弃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孔子是一个活得很累，又有丰富情感的老人。他的内心的这种分裂现象，实际上已经揭示了后世士人隐与仕两种道路的选择。晚年孔子实际上已经认识到理想与社会的尖锐冲突，个体的“士”（知识分子）总是在孤独中度过的，但这是求仁得仁，没有办法的事。

庄子的人生孤独感

10

如果说孔子一派儒家把社会群体的和谐视为天经地义，那末，稍晚一些的南方楚国一带的庄子学派则断然否定了孔子的这一社会理想。庄子从本体上论证了人与天地自然的尖锐对立，指出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不可能性，把个体的孤独视为达到自由人生的前提。他创造了神游天地，独往独来的逍遥境界，成为中国艺术的人格象征。

庄子看待人生的视界显然要比孔子更为宽阔，他从空间和时间上论证人与天地相比，只是很微末渺小的颗粒，根本不足以道。因此，人的自我孤独是与生俱来

的。在《秋水篇》中，庄子假托北海若的口指出：人活在世界上，就像小石小木处在巍巍巨山之中；又像一叶扁舟漂荡于汪洋大海之中，是多么渺小与空茫！后来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慨叹人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其中意蕴，不能不说滥觞于庄子的这一思想。

人在空间上如此微渺，在时间上又是匆匆过客，庄子一再哀叹人生天地之间，就像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人生如梦”，瞬息即逝。这些议论悲怆感人，可谓说尽了人生的短暂虚幻，是一种悲观厌世然而又是异常深刻的人生哲学。孔子后学一再弘扬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认为天地间惟人为贵，庄子则无情地揭示了人在宇宙中的孤独与微末地位，指出人活在世上本来就是一场悲剧，而世人却不懂得这一点，在有限的年华中，不珍惜生命，为获取外界的荣华富贵而奔波、挣扎，消耗生命，一直到老了才发觉世事一场大梦，可不悲哉！

庄子认为，人与人之间也充满了杀戮、欺诈。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在社会的剧变过程中，战争频繁，道德沦丧，为富不仁，尔虞我诈，而这一切，与人们对物欲的疯狂追逐相关。作为一名旧贵族阶层的成员，庄子对原始社会中人们的自由十分神往，而认为文明的发展导致了人性的异化，然而对人性的倾覆他又深感无力回天，从而陷入了一种类似于